

邓小平的改革岁月

武国友◎著

海博



新华出版社



外文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邓小平的改革岁月

武国友◎著



新华出版社



外文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前 言

深受改革之惠的中国人民，今年迎来了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诞辰110周年。回首改革开放的历史，重温邓小平指导我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已成为而今人们关注的一大热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拨乱反正，勇敢地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开辟了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由于有邓小平这样富有政治远见的卓越领导人掌舵指向，我们党和国家既走出了“文化大革命”的阴影，又避免了陷入新的混乱和迷惘，成功地走上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幸运和自豪。

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邓小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教训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科学地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创立了伟大的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的创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一切成就，都是在这一伟大理论的指引下取得的。实践证明，这个理论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要实现21世纪的预定目标，就必须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

邓小平高瞻远瞩，富有科学精神和创造精神，他把远大的理想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相结合，设计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确定了我国国家从贫穷走向富强的“三步走”发展战略，在本世纪末实现小康，在下个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已经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

他对当代中国基本国情作出了科学的判断，提出了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认识，从而明确了我国社会所处的历史方位。根据我国所处的历史方位，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要一心一意搞建设，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松，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

邓小平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要求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必须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按照民主化和法制化紧密结合的要求，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他把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紧密结合起来，提出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作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伟大构想。按照这一构想，我国顺利实现了对香港和澳门行使主权，并使海峡两岸的关系取得重大进展。

邓小平无限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他说：“我的生命是属于党、属于国家的。”“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正因为如此，他尊重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时刻关注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总是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

回顾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历史，我们会深切地感到，邓小平以他那伟大政治家的气魄和胆识，凭着他对当代中国和世界的深刻了解，为使党和国家重新走在时代潮流前面，为中华民族以更强大的力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规划了崭新的切合实际的宏伟蓝图。他立足中国大地而又面向世界，正视国情现实而又放眼未来，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高瞻远瞩地构思和设计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整套发展战略。他突破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传统认识，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计划和市场不是区别姓“社”姓“资”的标志，使我们党通过“十四大”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古老的中华大地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邓小平启动和设计的改革开放，经过不断的探索、实践，已使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民经济迅速发展，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明显提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确立，对外开放总体格局基本形成，各项社会事业取得巨大成绩，原定小康目标已总体上实现。放眼神州大地，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民族团结、社会进步，到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中国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成为不同国度、不同肤色的人们所关注的热点。人们渴望了解中国改革开放伟大而曲折的历程，更希望了解作为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对我国改革开放所作出的历史性功绩。使各个方面更多地了解我国的改革开放，更多地了解邓小平正是我撰写这部书的初衷。

目 录

一、伟人本色：在历史的转折关头

1. 艰难的第三次复出..... 2
2. 自告奋勇抓科教..... 12
3. 搞“两个凡是”不行..... 24
4. 发表“时代宣言”..... 35
5. 拨乱反正..... 40

二、惊世之举：推进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1. 历史定位：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46
2. 慎重突破：改革在农村率先兴起..... 51
3. 全面展开：改革要从农村转到城市..... 61
4. 精心设计：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 68
5. 一锤定音：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76
6. 领导艺术：允许看，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82

三、实现领导干部的新老合作与交替

1. 优选之路：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 90
2. 让路接班：这个问题不解决，就可能要亡党亡国..... 95
3. 组织过渡：建立顾问委员会..... 101
4. 建设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107

5. 依法治国：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	112
四、对外开放：让中国走向世界	
1.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122
2. 要办经济特区，“杀出一条血路来”·····	125
3. 纷纭百端议特区·····	128
4. 亲自到经济特区实地考察·····	135
5. 建立经济特区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不是收而是放”·····	147
五、强国之梦：重塑中华形象	
1. 雄心壮志：建立一个小康社会·····	154
2. 精神文明：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	166
3. 伟大构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177
4. 和平外交：为现代化建设争取一个良好的国际和平环境·····	187
5. 威武之师：把我军建设成为 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	198
六、率先垂范：完成最高领导层的新老交替	
1. 实现半退：退出中央委员会·····	210
2. 完全引退：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	215
3. 顺利交班：组建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	219
4. 关注世界：我退休了，但并不是不关心天下大事了·····	225
5. 关心祖国：我的生命是属于党，属于国家的·····	233
6. 特邀代表：我要为这个报告鼓掌·····	237
七、春天的故事：第二次视察南方	
1. 真诚希望：提高效率，力戒形式主义·····	246
2. 再三叮咛：“你们要搞快一点”·····	251
3. 明确断言：特区姓“社”不姓“资”·····	262
4. 热情鼓励：能跳还是要跳·····	272

5. 真诚希望：起点更高一点，后来居上·····	275
6. 郑重告诫：改革开放必须“换脑筋”·····	280
八、鞠躬尽瘁：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	
1. 最终愿望：过一个真正的平民生活·····	288
2. 历史嘱托：《邓小平文选》·····	294
3. 无私奉献：一切属于祖国和人民·····	300
4. 再道一声：小平您好·····	307
5. 伟人辞世：举世同悼·····	314
后 记 ·····	319





伟人本色：在历史的转折关头

1. 艰难的第三次复出
2. 自告奋勇抓科教
3. 搞“两个凡是”不行
4. 发表“时代宣言”
5. 拨乱反正

1. 艰难的第三次复出

1976年10月，党和人民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延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粉碎“四人帮”后，中国要从极“左”的困境中走出来，并将走向新的历史时期。新的时期在客观上需要有新的代表人物来体现人民的心愿。在毛泽东逝世以后，无论是从资历上，还是从符合时代的要求上，任何人都莫过于邓小平，他最能代表人民的期望和时代的要求。正因为如此，所以叶剑英、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才从这种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工作的需要出发，多次向华国锋提出建议，让邓小平早日出来工作。然而，华国锋在高级干部打招呼会议上讲揭批“四人帮”斗争时，却同时提出了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问题。这反映了在刚刚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的思想和工作部署是把揭批“四人帮”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双箭齐发，用一只手打倒“四人帮”，用另一只手压住邓小平等老干部不准他们出来工作。中央分管宣传工作的汪东兴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针对群众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的愿望，说：“邓小平也有错误，他不听毛主席的话，还搞他过去那一套。”“邓小平问题，毛主席已经有一个四号文件。四号文件不管怎样是正确的，是毛主席的指示。”“他对‘文化大革命’还是不理解，三个正确对待做得不好。”群众对汪东兴的说法不服，在天安门贴出大字报，逐条批驳了他。另一位中央机关的领导人竟错误地把邓小平同“四人帮”等同起来，说什么“邓小平和‘四人帮’有三个一样：一样反毛主席，一样反毛泽东思想，一样反主席的革命路线。因此，批邓和批‘四人帮’是一回事，不是两回事。要把批‘四人帮’和批邓结合起来，不能放松批邓”。并且强调：“我们要警惕，有人要为邓小平翻案。”这些话和思想感情，完全违背了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意愿，他们坚持“文化大革命”中的错案，干部群众对此十分不满。

邓小平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但政治上坚定而又坚韧不拔的人物。早在中央苏区时期，因坚持正确路线而被打倒。1931年，邓小平奉命从上海进入江西中央苏区。这年8月，出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1932年5月以后，他又先后担任会昌县委书记、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县委书记。这段工作期间，邓小平比较地采取了与本地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斗争策略。1932年11月，广东军阀陈济棠突袭会昌、寻乌、安远等地区。邓小平根据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采取了灵活的游击战术以阻击敌人的进攻。当时，对于中央“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做法采取了抵制的态度。他与任永丰、吉安、泰和中心县委书记的毛泽覃，任赣东特委书记、江

西省苏维埃政府委员、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江西省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兼独立第五师师长的谢维俊，任寻乌县委书记、寻乌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的古柏，分别发表过一些有利于反“围剿”和巩固革命根据地的看法和拥护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认为苏区的山上有马克思主义，倒是大城市产生了立三路线。这些正确意见，正好刺痛了当时的李立三。于是便遭到李立三的忌恨而成为其被打倒的有力“证据”。1933年2月，在福建开展了所谓反“罗明路线”的斗争，3月，便在江西开展了所谓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打击所谓“纯粹防御路线的拥护者”，直接批评了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心县委“执行了纯粹的防御路线”。4月16日，江西省委召开了工作总结会议，批评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是“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在这场斗争中，邓小平第一次成了受害者，他被称为“毛派”的头子，即“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之头。邓小平的这次被打倒，受到“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执行者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给了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并被下放到中央苏区边境的乐安县南村区当一般干部——区巡视员。他的这次被打倒一直到遵义会议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占领统治地位才算最后重新站起来。不过，邓小平的这次被打倒，虽然受了一些挫折，但这却为他第二次被打倒后的再次复出埋下了伏笔。后来，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谈到有关邓小平第二次复出的问题时就谈到了这一点。她说：

“父亲在第二次倒台后之所以能受到毛泽东的起用，除了在毛泽东的批示中所谈到的和毛泽东认为邓小平‘人才难得’等因素以外，三十年代的‘邓、毛、谢、古’事件，的确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这是因为，邓小平当时挨整的原因，就是邓小平当时执行的是毛泽东所主张的政策和做法，也就是‘毛派的头子。’

‘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这是毛泽东的一句名言。

三十年代的这一场斗争，把邓小平划进了毛泽东这一派里面。

对于这一点，毛泽东是记得的，而且记了整整四十年。

这，是当时挨整的邓小平连想也没有想到的。”^①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邓小平后来复出能够借此因由，这也正好体

① 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19页。

现了祸福转换的辩证法。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后，由于邓小平与毛泽东的政治路线不相协调，特别是邓小平与毛泽东关于通过“天下大乱”以达到“天下大治”的战略部署相抵触，因而他又第二次被打倒。

1965年11月，经毛泽东批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得以发表，以此为契机政治大批判便铺天盖地而来。对此，邓小平和刘少奇等人事先并不知情，因而他们试图将这场运动限制在学术范围内，但未能做到。“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以后，他们又力图使运动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并对一些“极左”错误进行抵制。1966年6月，邓小平随刘少奇飞赴杭州，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并请毛泽东回京主持中央工作，而毛泽东却委托刘少奇和邓小平相机处理运动问题。

为了制止混乱局面，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未经毛泽东批准便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对于这件事，毛泽东从外地返京后便提出严厉批评，说刘少奇和邓小平是“镇压学生运动”，犯了“方向错误”，并作出撤销工作组的决定。8月，在中共八届十一全会上，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文章的矛头明确指向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这次全会改组了中央，邓小平虽然仍被选为政治局常委，但实际上已经靠边站了。

此后不久，掀起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10月，在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和刘少奇被点名批判，并被指责为“错误路线的代表人”。10月23日，邓小平被迫在会议上做了检讨。11月8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贴出《邓小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字报，诬称“我国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刘少奇，二号走资派就是邓小平”。

紧接着，在江青等人的鼓噪下，社会上先后提出了“彻底打垮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口号。从此邓小平被作为第二号走资派被打倒。

1969年秋，邓小平度过了两年的关押生活之后，被以“战略疏散”的名义流放到江西。在周恩来的精心安排下，邓小平和夫人卓琳、继母夏培根以及陆续来到身边的子女，在江西度过了4年的劳动改造之后于1973年春返回北京，不久又被恢复职务，得以复出。

邓小平这次复出，是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经过了这次政治打击而产生的政治转念。同时也是邓小平批判林彪引起毛泽东对往事的钩沉。1972年8月3日，邓小平经过深思熟虑之后，通过汪东兴致信毛泽东，陈述了对林彪事件的一些看法，同时也向党中央提出了愿为党和人民做一点工作的要求。这封信又重新唤起

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好感，8月14日，毛泽东在批示给周恩来并转汪东兴的信中这样写道：

“（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①

不过，在这个批语的前面毛泽东还写上了这样一句话，“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在这里，毛泽东虽然将邓小平与刘少奇作了区别，但还是将他作为犯错误的同志看待的。这种看法本身就影响了邓小平复出的进程。因此，在毛泽东批示之后还是迟迟不见下文。对此，周恩来非常着急，于是便在毛泽东的指示被搁置了4个月之后，在1972年12月18日，又提笔致书记登奎和汪东兴二人，信中写道：

昨晚主席面示，谭震林同志虽有一时错误（现在看来，当时大闹怀仁堂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但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此事请你们二人商办，他在桂林摔伤了骨头，曾请韦国清同志注意帮他治好。王良同志了解其情况，可问他关于震林同志一家的近情。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

尽管周恩来为之付出了较大努力，但他还是于1973年2月才接到中央的通知后姗姗来京。

3月1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工作。随后，中央正式做出恢复邓小平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决定。4月13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宴请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邓小平以副总理的身份公开亮相。

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同政治局有关同志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中还富有风趣地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他一生大概

^① 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第318页。

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接着，毛泽东又转过来对身边的邓小平说：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改吧。在这次谈话后不久，12月22日，中共中央就发出通知，决定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中央和军委的领导工作。

邓小平复出后，加强了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方面的正义力量，对此“四人帮”却深为恐惧，于是便出来阻挠，设置障碍。1974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人选，江青等人坚决反对派邓小平出席。此事引起毛泽东的极大不满，3月27日，他致信江青，说：“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

10月4日，毛泽东又提议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10月20日，毛泽东又建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1975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1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在1月上旬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邓小平又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2月以后，由于周恩来病重，所以邓小平开始主持国务院工作，并在实际上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

邓小平开始主持中央工作以后，即开始大刀阔斧地对全国各个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力图在实际工作中纠正“文化大革命”的极左错误。

邓小平的这次整顿主要是围绕着“学习理论、反修防修，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个方面来展开的，即“三项指示为纲”。邓小平在整顿中所依据的这三项指示，并不是邓小平的凭空想象，而是根据毛泽东在不同时间、地点和场合所讲的有关精神综合而成的。

毛泽东讲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这一指示，10月11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准备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通知》中正式传达。此后，毛泽东还多次提到安定团结的问题；关于反修防修的问题，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毛泽东经常提到的问题。1975年6月21日，毛泽东在会见柬埔寨共产党中央书记波尔布特时特别提到：我们现在正是列宁所说的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个国家是为了保护资产阶级法权。还说，一个社会主义、一个资本主义，我们现在还是两种可能。中国将来可能也变修正主义，但是最后还会回到马克思、列宁的道路。1974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他81岁生日这一天，同周恩来谈话时又提到了这个问题。他说：我同丹麦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

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而后，又谈到列宁关于小生产滋生小资产阶级的生活作风，我们也要防止变修正主义的问题；到了1974年，由于8年“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再加上“批林批孔运动”的严重影响，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下降的局面。钢产量比1973年下降了410万吨，原煤产量也下降了400万吨，铁路货运量下降5.3%，比1973年少运4321万吨。1974年11月，李先念等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了国民经济的这一情况。毛泽东听了汇报后指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1975年1月，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贯彻了毛泽东的这一精神。四届人大后，经毛泽东圈阅同意的《中共中央批转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中，作为要求，写上了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一指示。

邓小平正是根据这些指示的精神，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三项指示为纲”是邓小平的一个创造。此后，邓小平就根据它展开了大刀阔斧的整顿。他首先从理论方面入手，针对“四人帮”提出的反“经验主义”、“穷过渡”等错误论调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后来，邓小平在回顾这段斗争历史时曾这样说道：

“关于共产主义，‘文化大革命’中有一种观点，宁要穷的共产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我在1974年、1975年重新回到中央工作时就批驳了这种观点”。

“当时我告诉他们没有穷的共产主义，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共产主义社会是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因为物质极大丰富，才能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

在坚持与“四人帮”进行理论斗争的同时，还抓了安定团结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主要抓了“反对派性”“调整领导班子”“落实政策”“恢复和健全规章制度”“打击各种破坏活动”等五项工作。有效地恢复了社会秩序和工作秩序。

在这次治理整顿中，重点抓了恢复和发展经济的问题。提出了加快发展工业中的重要问题和解决的办法，在政策方面强调要“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扩大进出口”；在科技方面强调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开辟新兴科学技术领域，使科学和技术起到国民经济的先导作用。提出“科学技术叫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的口号。为使国民经济健康有序地发展，还拟定了十年长远规划，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纲要》把十年的奋斗目标确定为：在1980年以前建成我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到1985年，进一步完善全国的经济体系，基本完成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实现笨重体力劳动机械化，基本建成六个大区不同水平，各有特点，各自为战，大力协同，农、轻、重比较协调发展的经济体系。邓小平主持的这段整顿是符合社会发

展需要的，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心愿，因而这段整顿也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绩。

就经济发展而言，1975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4467亿元，比1974年增长11.9%。其中工业增长15.1%，农业增长4.6%。粮食产量创历史最高水平。进出口贸易额147.5亿美元，超过以往任何一年。财政收入815.6亿元，比1974年增加32.5亿元。整顿使这一年的经济发展状况成为“文革”10年中最好的一年。

整顿固然取得了成绩，但整顿也使得邓小平与毛泽东又产生了某些矛盾。在对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邓小平主持1975年的工作，对工交、财贸、文艺、教育等进行了全面整顿，这就总体而言则具有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意义。而对于“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则认为成绩是主要的，应该“三七”开。毛泽东认为邓小平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一是不满，二是算账”。对此，毛泽东是难以容忍的；在路线问题上，毛泽东主张以“阶级斗争为纲”，而邓小平主持的这段整顿则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因此，毛泽东批评邓小平：“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在思想理论问题上，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货币交换不是致力于促其发展，而是强调进行限制，对于按劳分配，不要促其实现和完美，而是加以抑制。而邓小平则是主张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应大力发展生产力，要为未来实现共产主义的物质极大丰富创造条件。

由于邓小平与毛泽东产生了这些认识上的分歧，再加上“四人帮”一伙从中添油加醋，这就决定了邓小平必然会第三次被打倒。

邓小平的复出，使“四人帮”“组阁”的迷梦破灭了。“四人帮”对此并不甘心，于是他们以加倍的疯狂来讨回他们的失败。他们先是发动“批林批孔运动”，以“评法批儒”为因由，企图打倒周恩来，压制邓小平。继而又掀起一个“评《水浒》运动”，凭空捏造，诬陷周恩来和邓小平，说他们是投降派，想要架空毛主席，企图以此手段整倒周恩来、邓小平，取而代之。同时，他们还利用毛远新与毛泽东这个特殊关系去告邓小平的黑状。从1975年9月到11月，毛远新多次向毛泽东诬告邓小平。他说：“对‘文化大革命’，有股风，似乎比1972年批极‘左’还凶些。”“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我“担心中央，怕出反复。”“‘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上去了。”

由于毛远新屡进谗言，这令毛泽东感到邓小平的全面整顿会导致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因而对邓小平的态度发生了变化。1975年10月20日前后，邓小平为了如实地反映清华大学的有关情况，于是便将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批评迟群、

谢静宜的信转送给毛泽东，然而毛泽东却认为这封信的矛头是对着他的，还说邓小平偏袒刘冰。根据这一指示，11月初由清华大学发起，教育界开始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不过这时毛泽东还没有彻底打倒邓小平的意图。但是持续9个月的整顿却被迫中断了。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不幸与世长辞。1月15日，邓小平在周恩来的追悼会上，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为周恩来致了悼词之后，从此就不再公开露面。紧接着在天安门事件爆发后，他便第三次被打倒。不过，在这里我们应该看到，邓小平的第三次被打倒是不正当因素暂时占了上风使然，一旦正义因素上升，邓小平就一定重返政治舞台。

这种苗头果然出现了，粉碎“四人帮”后，人民首先想到了要请邓小平复出的问题。因为邓小平坚持正确路线，他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斗争实践中，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作出了巨大贡献，是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之一。1975年他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着手对许多工作进行整顿。努力纠正“文革”错误，使国内形势明显好转，得到人民的拥护。在粉碎“四人帮”的新形势下，他最能代表人民的心声。

但事情并不是像人民想象的那样，粉碎“四人帮”后，广大干部群众期望邓小平出来工作。而华国锋、汪东兴等却坚持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与人民的意愿背道而驰。当时，胡耀邦曾托人给华国锋捎口信说：“停止批邓、人心大顺”，这表达的正是亿万人民的心情。可是这时华国锋等人心里想的却是另外的问题……

高举着“两个凡是”旗帜的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后不久就打出了他的招牌。1976年10月26日，华国锋听了宣传口的汇报后，针对广大干部群众纷纷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强烈呼声，讲了四点意见：（一）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二）“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三）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四）天安门事件要避免不说。这就为几个重大问题定了调子。1977年3月10日至22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会前，文件起草人在为华国锋准备报告时，华对他们讲了有关报告的想法，对内容的结构都定了框子，中心意思就是按“两个凡是”的原则来对待邓小平和天安门事件问题。根据华国锋的指示写成的“报告”，的确通篇贯穿着“两个凡是”的精神，大讲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强调充分认识“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要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在肯定“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的同时，还强调了批邓的“必要”性，并且把邓小平的问题同“四人帮”余党的问题联系在一起。还似乎蛮有道理地讲到，“批邓

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定的，批是必要的。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决定当时要继续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这是经过反复考虑的。这样做，就从根本上打掉了‘四人帮’及其余党和其他反革命势力利用这个问题进行反革命煽动的任何借口。”

诚然，这里的确有一个所谓的“借口”问题。因为请邓小平复出和“两个凡是”之间存在着一个逻辑上的悖论。邓小平的第三次被打倒是因为他在1975年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工作期间，对各项工作进行了全面整顿。对一些冤假错案给予平反，还解放了一批老干部。这种全面整顿在客观上，就必然是系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这无论如何也难以得到毛泽东的容许，更为“四人帮”所记恨，于是邓小平又在矛头直接对着他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被打倒。请邓小平复出，那就不仅意味着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而且也意味着，在粉碎“四人帮”以后要走一条与“文化大革命”不同的建设道路。这正恰恰是“凡是”派所难以接受的。因此，压制邓小平复出，与执行“两个凡是”的方针，就必取其一。

华国锋和汪东兴对邓小平复出的压制，是违背人民心愿的，更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所难以接受的。尚在“四人帮”刚刚被粉碎的时候，叶剑英就给邓小平打了电话，通报扫落四颗灾星的喜讯。并对邓小平的第三次复出预作了安排，对这件事邓小平的女儿毛毛曾这样回忆道：

“记得，为了让父亲第三次复出，叶伯伯让他的小儿子亲自驾车，把还在软禁中的我的父亲偷偷地接到他的住处。当时我在场清清楚楚地记得！他们两人见面之时，万分激动，父亲长声叫了一声‘老兄’，两人的手便紧紧握在了一起。”^①

1976年10月8日，当叶剑英得知华国锋在中央打招呼会上提出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便于翌日向华国锋提出：“赶紧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恢复他原来的职务。”但是无论是胡耀邦的话还是叶剑英的话，华国锋都听不进去，仍然固执地强调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10月10日，邓小平给华国锋并中央写了一封信，以此来表达他对粉碎“四人帮”的情感。邓小平的信这样写道：

“最近这场反对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的斗争，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这样一个关键时刻紧接着发生的，以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战胜了这批坏蛋，取得了伟大胜利，这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这是社会主义道路战胜资本主义道路的胜利，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胜利，这是

^① 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第641页。